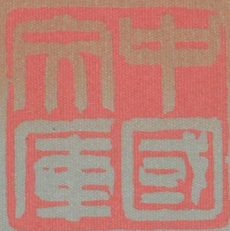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综合 · 普及类 ·

编辑忆旧

赵家璧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文库

综合·普及类

编辑忆旧

赵家璧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忆旧/赵家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108-02795-5

I. 编… II. 赵… III. 编辑工作—文化史—中国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5402 号

责任编辑: 叶 榕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董文权

编 辑 忆 旧

Bianji Yijiu

赵家璧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108-02795-5

定价: 30.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 琦 王瑞书 边彦军 吕建华 刘玉山 刘国辉
刘健屏 李 岩 李保平 李 峰 杨 才 杨 耕 杨德炎
吴江江 吴希曾 吴尚之 吴 斌 何林夏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张伟民 张 琦 陈 鹏 胡守文 俞晓群 祝君波
贺圣遂 贺耀敏 栾世禄 黄书元 曹 铁 龚 莉 惠西平
程大利 焦国瑛 解 伟 薛炎文

“中国文库”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伯根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潘凯雄

出版编务组：

李红强 仵永成 蔡增裕 谢仲礼 乔先彪

全冠军

目 录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I
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	8
从爱读书到爱编书	10
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	
——《一角丛书》	12
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	29
为了出好书	
——《鲁迅与书》序	43
重见丁玲话当年	
——《母亲》出版的前前后后	46
丁玲赠我以《母亲》	59
鲁迅与《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61
鲁迅·麦绥莱勒·连环画编文	
——参加连环画研究会有感	77
关于周扬编《高尔基纪念论文集》	88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92
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	137
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	
——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中篇创作新集》	150
记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说年选	158
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	165

关于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184
徐志摩和《志摩全集》	
——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	194
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	222
徐志摩和泰戈尔	234
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	239
追叙未完成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252
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	265
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	285
悼念蔡元培先生	296
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	
——《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两本长篇小说	299
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	
——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	302
一面战斗、团结的旗帜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成立五十年	311
后 记	315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1922年我进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国文老师王者五见我喜爱看书，就把教员办公室书橱里几包多年来尘封未动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给我带回家去。这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定期刊物这一出版形式，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更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发现课本之外还有一个极大天地。接着我便常去离家不远的松江县立图书馆，借阅新文艺小说和《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正巧这两年暑假，由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校长的景贤女中，假图书馆大礼堂办了两期暑期学术演讲会^{〔1〕}，应邀来松演讲者有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沈雁冰等，我和几位小朋友都去听了。当时说不上听懂多少，至多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对最后两位演讲者印象甚深，因为我已从《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的版权页上，知道他们分别是两种杂志的编辑。1923年，上海创办了《弥洒》，这本曾被鲁迅认为五四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月刊，三位创办人中，赵祖康、钱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贤女中教书。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潮，这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松江人编的，二则赵祖康的堂弟就在我们班里。事过后，我就和同级好友夏侠（松江叶榭人，天资聪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厌世自杀）商议，我们自己不也可以编个刊物吗？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师的同意下，在毕业前几月，居然用油印机编印了几十本分送级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内容如何，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弥洒》的出版，确实给了我长大当了个文艺编辑的第一个启示。

〔1〕 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232页，人文版，1981年。1922年1月，曾出版《松江第一次暑期学术演讲会演讲录》，见翟同泰：《茅盾答客问》，《文教资料》，1981年6月，第13页。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我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一年级。6月3日，美国校长卜芳济在全体爱国学生面前，竟不让升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强把国旗夺下，踩在脚底，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暑假后，离校师生五百余人在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们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暨附中，我就转入附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反帝热情。附中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设编辑部，出版附中校刊《晨曦》，我被推为四个编辑之一。1927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编。我便大刀阔斧地把从教会学校带来的校刊中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砍掉了。编排方法、封面设计和用纸都来了个大革新。虽是综合性刊物，重点放在文艺上。每期十二万字，由校内师生执笔，用白道林纸印一百八十页，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册，向校外公开发行。印刷成本除自治会经费外，不足之数，分别向同学家长所办工商企业兜揽广告，以资弥补。这三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文章，除发表于校刊者外，也投向《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和《申报·艺术界》等。校刊的清样，我自己上浙江路华丰印刷所校读；书出版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踏车去本市分销处送货。眼看手写的文稿，一旦排成铅字，顿时变了样；再印在白纸上，加上一个漂亮的封面，钉成本本，送到众人手中，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在社会上起着它自己的作用。这个奇妙的过程，大大地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感到我的一股劲，从此有了使处了。直到今天，我的书柜里还保藏着两卷合订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为我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脚点，更增加我对这一纪念物的爱抚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它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1〕}，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从附中毕业是1928年夏。这年春，我代表附中毕业生参加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光华年刊》编委会，让我当印刷主任。通过一位广东籍同学的介绍，第一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谈就谈拢了。这家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别具一格的新型出版机构，华侨

〔1〕 此书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第8页。

投资，实力雄厚，备有新式印刷机，颇具规模，经营作风也正派。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广东台山人，在岭南大学读过书，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读物，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是一位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新型企业家。年刊印刷任务被接受后，我经常往“良友”跑，和伍联德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年刊印成前夕，我向他告别，大家都有不胜依依之感。言谈间，我随便问他：“你们出了各种画报，如体育的、妇女的、电影的等等，为什么不出一种专给大学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说：“你写个书面计划来吧！”9月中大学开学。有一天，他忽然驾车来校找我，说计划很好，邀我半工半读，立刻去担任编辑。这样的好运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自问究竟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决不敢独自去冒这个险。随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编，我任助编，1929年1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了。可惜内容与我原计划的不同，销路呆滞。第二期起，明耀五辞职，去汉口教书，伍联德推我上台，就这样一直编到大学毕业前一年——1931年。



1927 年最早参加编辑的《晨曦》书影

张天翼作《畸人集》精装本书影

我是沿着“良友”所出画报的传统方法编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知识性，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时，日帝魔掌已深入东北宝地，蒋介石提倡不抵抗主义，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1930年秋，学校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挑起的一场学潮，我亲身挨到的拳打脚踢，大大地冲击了我那种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秋天，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反革命文化“围剿”随着在上海开始。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正如鲁迅所说：“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暗暗改换店主‘重复旧业’的也有。”而“良友”独处北四川路，却像世外桃源，什么风浪也刮不到它。我虽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系，自己喜欢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搞些翻译，写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触到的国内外形势和阅读到的革命书刊，给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马路看看开明、北新和其他进步新书业的文艺出版物，开始感到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回头看我去三年走过的道路，不免自惭形秽。再环顾新书业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毕业，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吗？“良友”过去也出版过三十多种文艺书，未受读书界的重视。我就暗自盘算：能否在这里另辟一条出文艺书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联德的同意，就把《中国学生》停办，专编文艺书。伍支持我开始稳扎稳打，从小做起。于是售价一角的《一角丛书》从1931年9月初开始出版。

这套综合性的小丛书，主观上争取多出文艺方面的。当时我认识的成名作家仅有同乡施蛰存，他第一个出来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国诗和小说；陈梦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就是在徐志摩家认识的。小丛书出了几种，反应平平。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内风云，瞬息万变。我意识到组稿工作再打不开，便无法满足大时代激荡下万千读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刻，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开始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随后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他的到来，真似天上降下了一颗大星星，照亮了我

前进的道路，也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暑假毕业后，伍联德把我留下，接受了我的要求，《中国学生》停刊，给我一个出版部主任的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当时《良友画报》销四万份，是全国销路较大的刊物之一，总编辑先是梁得所，后由马国亮继任，另有助编三四人。其他画报和刊物都由一人负责。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闯个新天地了。

巴金同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而作》的文章中说得完全对：“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1〕但对那时的我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我是否能在这个公司里留得下去，实现我的理想，就靠我能否找到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所以“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时，来了郑伯奇，我的胆子更大，我的编辑思路更活跃了。组稿局面既已打开，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这五年多时间里，我能够编辑出版不少好书，第一要感谢支持过“良友”事业的许许多多作家同志们。

最早为《一角丛书》写稿的“左联”作家，有丁玲、阿英、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等，这套丛书共出八十种。1933年初，新创《良友文学丛书》，事前，由郑伯奇陪我去谒见鲁迅。鲁迅听我说愿意把文艺编辑作为自己终生事业时，他老人家亲切地鼓励我：“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过了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著名作家的手稿源源不断地到了我的手中。1934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过程中，由于鲁迅接纳了我的请求，收回成命，继续编选，才不致功亏一篑。这些往事，我都已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最近我把此书赠送给叶圣陶老先生，他给我复信中说的几句话，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语。叶圣老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其于‘良友’，即已尽力不少，信可感念。”

就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又编辑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和《徐志摩全集》等成

〔1〕《解放日报》，1982年7月1日。

套书，最后两套，因故未能与读者见面。此外单行本也出了不少。我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编辑工作不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有些书也可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如果出了好成果，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保存下去，世代相传，也能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些积累的工作。

30年代因组稿关系认识的作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少人与我建立了友谊。特别有几位著名作家如郑振铎、老舍、巴金等，在我此后数十年历经磨难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分别给予我终身难忘的鼓励和种种帮助。就靠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的友情，才使我一直站在文艺编辑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没有退却，没有掉队。编辑和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近，《新文学史料》总第14期刊出郑伯奇遗作《左联回忆散记》，有一段话提到我。他说：

“一·二八”事变以后，我应聘去作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我化名郑君平，不久身份就暴露了。好在这家书店以前是不问政治的，特务虽然来侦询过几次，我都躲避开了，店方也还应付过去。那时候，赵家璧同志刚从大学毕业，富于事业心，对新事物很敏感，对人也很有热情。我们彼此有了相互了解，便着手商订《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在组织稿件方面，他奔走出力最多，因为有些作家，我是不便出面，也不愿意去见的。不可否认，这些丛书的内容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作者的名单也比较复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计划颇受读者欢迎，书店由此得到鼓励。

遗文末段所提的批评，完全符合当年的史实。因为如果不那样做，“良友”作为一个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据点，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而不遭破坏的。今天回顾，从另一角度来看，组织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出版，对今天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倒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可以了解当年文艺界的全貌，也保存了一些有用的甚至是有益的资料。当时“良友”组稿的面是广的，但也并非广大无边。

回想 30 年代许多著名作家乐意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良友”出版，还有一条至今为作家朋友们所津津乐道的，那就是“良友”书籍装帧好。我们的文艺书极大部分是布面或纸面精装，有的外加封套封腰，许多书用米色道林纸印，这就深得作者的欢心。张天翼的《畸人集》，共有八百页，布面精装一厚册，包封正面印上作者近影，底面介绍作者另外两部新作。当年天翼拿到样书时，逢人便夸说这部书：“我的书第一次穿上西装，看多美啊！”可惜他所藏样书，十年浩劫中丢了。去年我去青岛开会遇见沈承宽同志，她说，天翼非常想念这个本子。她知道我手头还有，便托我照个书影给她。据说，病中的天翼见到这幅照片，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这类装帧，鲁迅生前曾戏称它“良友式”，主其事者是“左联”成员汪汉雯，他经张天翼介绍，来“良友”负责文艺书的美术装帧设计，他是我唯一的助手。

1937 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所在北四川路陷入战区，公司经理（伍联德早已辞职）把能赚大钱的《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向香港政府登记出版。留在上海的职工全部被解雇，我也失业了。从童年时代就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当一个文艺编辑，经过约十五年的个人奋斗，终于得到了实现，这时又告中断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我要把这个辛苦经营、略有建树的据点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在 1939 年在上海成立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我仍然负责文艺编辑。因篇幅关系，不属于本文范围之内了。

编辑是一门学问。解放后不久，罗竹风就提出：编辑是杂家，在我国古已有之。最近郭绍虞说：“学有二，有个人专攻之学，有社会通力之学。”〔1〕后者就指编辑学吧。《书林》编辑部约我为“治学篇”栏写稿，此文怕不合规格，因为我仅把它写成又一节《编辑忆旧》而已。

1982.7

原刊于《书林》，1983 年第 1 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1〕 郭绍虞为《萝轩变古笺谱》所作序，《上海文学》1981 年 9 月号。

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

使我对于文学逐渐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是刘韦士·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大约是十三岁那年，正在乡间的高等小学里念书。偶然地在学校图书室里《少年杂志》的广告上，看到一部叫做《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童话的出版，说是欧美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读过，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它。于是写了一张邮政片给正在上海学医的六叔，要他到商务去买一本回来。在我的童年时代，六叔是最爱我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本黄书面黑框子的童话，便如我所愿般的从上海带回来了。

第二天，我便依次读下去。第一篇当然看赵元任先生的“译者序”。接连念了两遍，却不知道译者说了些什么。既知人家不要看序，序却依然写下去；既说排版的人不必把这篇序文列入，事实上序文却依然印在那里。简单的头脑，像给他绕了几个圆圈一样，有些不知所从的感觉。于是我对于这部书先前所抱的奢望，顷刻间被这一篇文章打得粉碎了（这一篇译者序，在译者是有意识模仿刘韦士·卡洛尔那种“滑稽”而“不通”的笔法，可是我至今觉得译者是有东施效颦的）。

译者序虽然使我失望，但是他所说“说来说去还是原书最好”那句话，我是懂得的。书末所说：“我已经说最好是丢开了附属品来看原书，翻译的书也不过是原书附属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更使我想到译者既说译书不必看，而他又说过欧美的小孩子都看过，我已是十三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原书来翻着字典念呢？于是从序文里把英文书名抄下了，等又一个星期六叔从上海回来，我就要他买一本原版书。当时他虽然表示过我不应当如此不自量力，但是四天以后，一本麦美伦袖珍本的 *Alice in Wonderland* 从邮局里寄来了。我在书内第一页上用钢笔谨慎地写上自己名字时那种不可名状的高兴，至今还能够体味到。这一部